

第七卷

中国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七版

中国社会学

第七卷

中国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学.第7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613-5

I. 中… II. 中… III. 社会学—中国—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9110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划编辑 姚映然
特邀编辑 罗红光
装帧设计 王小阳
美术编辑 张 布



世纪文景

中国社会学 (第七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2.5
插页 4
字数 321,000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613-5/C·336
定价 39.00 元

编 前 语

自太炎先生于1902年最早提出“社会学”一词以来,中国的社会学几经周折,几经兴衰,至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不消说前辈社会学家在思想培育和学科建设上的功业,单就中国社会学重建这20多年来看,众人为中国社会学塑造独特之品格、厚重之学统与扎实之学风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也足可一书了。我们懂得,今人的耕种和收获是对前人最好的纪念,而撒播的种籽又孕育着下季的丰收。《中国社会学》创办于今,一则为纪念前人,二则为推进积累,三则为探索方向。惟愿学人众志成城、协力开拔,共迎社会学的新春。

既然名为《中国社会学》,本刊作者自然是本土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本刊所选论文也大体包括三类:已在汉语学刊发表的论文或译文;已在外文学刊上发表的论文;未刊论文。本刊特别鼓励针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除前两卷由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并于年内出版外,今后每年出版一卷,并采用匿名评审制筛选论文。本刊草创,望学界同仁鼎力支持。不妥之处,还望不吝教正。

目 录

治理:乡土中国

- 3 传统中国再认识
——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 陈映芳
- 18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
——弱者的“韧武器” 折晓叶
- 47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
黄宗智、彭玉生
- 70 反抗与惩罚
——20 世纪 50 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 张佩国
- 102 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
——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赵旭东

社会学现象,学术与政治的实践

- 125 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 王铭铭
- 166 社会学知识中的社会意象
——Doxa 概念与布迪厄的社会学知识论 田 耕
- 191 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
——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 高丙中
- 206 国家同志:媒体、移民与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 景 军
- 229 王权神话与生育仪式
——一则大理神话与朝圣之间的结构关系 梁永佳
- 257 部落社会外婚制与亲属制度研究 张 岩

专题述评

- 303 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
——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 应 星
- 319 乡村政治研究诸问题
——对应星批评的回应和进一步思考 仝志辉
- 335 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
——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 吴 毅 贺雪峰 罗兴佐
董磊明 吴理财

CONTENTS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Rethinking on the Traditional China: Relationship of rural and urban China

Cheng Yingfang

Cooperation and Unconfrontational Resistance: Tenacious weapons of the weak

She Xiaoye

The Confluence of Three Historical Trends and the Prospects for Small-Scale Agriculture in China

Philip Huang & Peng Yusheng

Resistance and Punishment: Rural crimes and the order of the property law in Jiading county in the 1950s

Zhang Peiguo

Village as Problems and Problems of Rural Studies in China: Reflective of knowledge of sociology around 'Yanyangchu' s model

Zhao Xudong

Sociological phenomenon, Scientific Work and Political Practice

Chinese Social Theory: A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ivility

Wang Mingming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ocial within Sociological Knowledge: Doxa and Bourdieu's sociological knowledge theory

Tian Geng

An Ethnography of a Building both as Museum and Temple: On the double naming method as arts of politics

Gao Bingzhong

State Comrades and an Elderly Woman's Suicide

Jing Jun

Kingship and Pilgrimage: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a Dali myth and its ritual

Liang Yongjia

A Study on the Exogamy and the Kingship System in Tribes

Zhang Yan

Review: Issues on Rural Governance

Reviewing New Orientation of Studies on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Reading

Tong Zhihui: The Events of Election and Politics of Village in China

Ying Xing

Problems of Studies on Politics of Village: Response to Ying Xing's criticism
and further thinking

Tong Zhihui

The Path and Subject of Studies on Village Governance: Response to Ying
Xing's critic

Wu Yi, He Xuefeng, Luo Xingzuo, Dong Leiming, & Wu Licai

治理：
乡土中国

传统中国再认识^{*}

——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

陈映芳

[提要]本文对国内外学术界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并对上述中国观的形成机制作了反思性探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相应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这既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

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已成为中国知识界抵制全球化、倡导文化自觉的一个基本问题。追根溯源,我们需要就社会学与现代中国的“中国观”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梳理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被引入中国,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和认识自我的需要的结果。社会学不仅让中国人发现了西方的“社会”(作为“社会”的西方),也让中国人确认了自身“传统”的、“落后”的“中国”身份。

这其中,“乡土中国”作为中国传统性的主要载体,被国内外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一再剖析和确认。如今,在对现代性的审视中,它又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视角,以及可资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它还被视作拯救“三农”危机、规划现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观念的及现实的出发点。

但笔者认为,在重新审视我们的现代性认识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对我们的传统性认识作出反思。“乡土中国”作为中国观的重要部分,它的被建构、被确认,蕴涵着一些我们习焉不察的问题。

^{*} 原文刊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一、社会学与中国认识

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反思中,社会学之于中国现代思想、现代化历程的影响渊源,成为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同时,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种种尴尬处境,也多为识者所虑。^①

社会学自被介绍进中国,它不仅是中国人认识世界和确认自我的一个学科视野,也是思想家们规划民族国家现代图景的基本参照。近代中国人真正开始了解外部世界——“西方”——是从“坚船利炮”这样的器物开始的。由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了武器背后的现代工业及现代交通、现代教育及现代思想以及现代的政治制度。而通过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中国人开始发现了另一个西方——作为“社会”的列强各国。为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而留学英国的严复,注意到了西方世界中不同于中国的“社会”,并带回了解释那种社会的学说。^②

尽管,社会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中一门经验实证学科,其学科制度在中国的成形^③、它对于这个社会的演变实态及其变迁机制等的描述和解释,很难说对中国现代性的规划或实际进程起过多大的影响作用。但这不妨碍社会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对于中国思想界及一般社会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发现社会并解释社会自“传统”而至“现代”的转变,这原是社会学的使命所在。社会学之于近代中国,首先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古典社会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将每个人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解释为由个体间联结一起而又外在于个体的一种有机体。对这种个人

① “若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处境本来就很尴尬。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从无到有,其基本的学科分类体系、概念体系和论述方式都是沿用西方既有的设置来安排的”。参见渠敬东(2006)。

② 关于中国社会学,人们多认为从严复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算起,近年有学者认为康有为1891年在长兴学会所讲的群学亦属于社会学范畴。但本文意在探讨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认识论影响,所以主要着眼于西方社会学的引入。

③ 一般认为,国内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08年),最早设立社会学系的是上海沪江大学(1913年),这两所大学都是教会学校。

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有机性的解释,几乎被视作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严复的“群学”将西方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的阐释,诸如社会的有机性、公共性等介绍入中国。自此开始,何为西方、何为中国,中国的思想家们对于中国与西方列国之间的差异想像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规划开始有了切实的视野空间和思考方式。

然而,当人们选择一种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路径的时候,他们也可能是在选择一种特殊的价值,或者是选择一种身份认同。产生于西方经验之上的现代社会科学,当它们被移用到中国的现实中来的时候,对于中国人认识世界、解决自身认同危机的需要来说,它们所提供的,既是可能条件,亦是限制,这两个方面一开始便如影随形地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西方的文化价值,一向不乏鲜明的抵制。但对于内在于现代社会科学基本视野亦即认识论、方法论的规定性,却缺乏相应的自觉。这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认同焦虑的一个深刻背景。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还是抵制西方价值、如何接受又如何抵制这些问题上,多有反复而无果的讨论。在抛弃还是继承中国传统、能否抛弃又如何继承等问题上,亦难得要领。今天,当人们试图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性问题时,如何认识现代性的普世性与西方性,在此基础上如何探索中国现代性的可能?这些困惑再次成为横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

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为中国人提供了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必要的视野和必需的工具,但与此同时,它一开始就让中国人陷在了学科视野的某些预设之中。首先,作为现代性的重要价值目标,“现代民族国家”被视作“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单位。虽然当中国人睁眼认识世界时,对于中国人而言,欧美列强已成为对中国构成生存威胁的“西方”(一个被建构的地域概念、世界概念),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从一开始,即是以“中国”为基本单位的。尤其自甲午战争以后,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说,“东方”、“亚洲”这些地域共同体概念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如在近代日本那样的认同意义。^①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多样性及差异性 etc 亦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多余的或有害的因素而遭到排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双重标准的运用。一方面,中国人将作为对手的外部世界

^① “亚洲”概念在近代以来的日本一直具有特殊的认同意义。笔者以为,对近代日本而言,对“亚洲”的认同与“脱亚入欧”的冲动是同属于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

想像成一个整体的“西方”(甚至也包括了日本)。与此同时,却将自身定位于一个内部同质的民族国家。这种双重标准的合理性源泉,应与认识世界的二元模式有关:“先进”与“落后”的认识模式——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中国。

在这样一种认知模式中,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并非来源于自身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的参照比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在有形无形之中,帮助西方人确立了他们的现代社会观。以“传统”、“农业”、“专制”、“异教”等为特征的落后的“东方”、“亚洲”、“中国”等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曾经是象征异质性的“他者”,是确认西方社会现代性的重要参照。而随着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被中国人用于确认自我时,这样一种基本的比较方法连带着西方人的视角,同样也帮助中国人确认了自身与西方的异质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要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来认识世界、确认自我,同时又要本能地或理性地试图抵制西方价值及西方人的中国观。这样一种努力,从一开始,就不能不陷于一种特殊的自我矛盾之中。其一为,从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视角出发,发现差异、进而将差异性固化、本质化,原是很难避免的认知倾向。而与此同时,就内在于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诉求来说,将人类社会不同梯度上的地域性差异、民族间/族群间差异等化约为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同时将种种差异归纳定义为现代—传统、先进—落后之类的属性差异,亦是社会科学研究极易导出的结论。

一般来说,古典社会学视野中的异质性确认,主要通过二元对比的认识方法来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始于工业化的大变动的描述和解释中,“农业—工业”,“传统—现代”,“愚昧—文明”、“落后—发达”等的二元对比,不仅被用于纵向维度上对社会变动的历程及其结果的认识,也被延用于横向维度上的不同社会间的比较,“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据此成为现代社会科学解释世界的一个基本视角。

而作为社会学的最典型、最具有有效性的分析工具,“理想类型”不仅为二元对比的认识论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方法,^①亦使得社会学对社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的解释有了揭示对象本质属性以及不同对象间普遍属

① 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理想类型”并不限于二元对比的分析,如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类型被概括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等。但可以认为,二元对比方法多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来定义对象的本质属性。

性的方法上的可能。诸如“有机团结—无机团结”，“通体社会—联体社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的创立，使得社会学者在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描述中，获得了进入社会学意义空间的实际路径。

虽然说，作为一门以现代性为阐释对象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适用性毋庸置疑，它的西方出身，并不能构成我们否定它在中国的普适性的理由。而且事实上，就像学者们指出的，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都是直面社会危机而诞生的。^①但是，基于上述对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特性的认识，我们还是需要对社会学的中国认识、中国研究的源与流不断地展开反思。

事实上，这样的反思从严复他们就已经开始。对西方社会学的审视以及对现实中国的认同困惑，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家和社会学者的学科视野矫正过程和对“中国”的建构过程之中。即以“社会”概念在中国的译介、确立的历史为例，在“群学”至“社会学”的学科形成过程中，“社会”概念最终取代“群”概念，固然有日本汉译概念的重要影响，也与“正宗社会学”在中国的确立有关，但是，就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在清末思想家们那里，“群”概念的所指，较之“社会”概念，原有更深广的内容。一方面，康有为最初强调“群”的意义，是从人类普遍性以及中国思想传统来加以说明的，而不是简单的西方参照的产物。^②另一方面，“群”虽被一些维新思想家用以强调“学会”等政治团体的重要性，^③但它并不排斥普遍意义上的“人群”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当严复最初介绍西方社会学时，他对于日本的汉译“社会”概念应该已有一定的了解。而他之所以仍用“群学”概念，更可能是出于对“群”较之于“社会”所具有的意义的思考：“群”是“社会”的上位概念，“社会”仅是“群”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秩序的某些群）。^④但尽管如此，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正式登场，“群学”最终消逝于历史思潮之中。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不认为，是社会学所蕴涵的现代性意义以及“社会”概念所提供的社会现代化的规划路

① 见刘少杰(2006)。

②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他在1884年就开始探讨“生物之源，人群之合”的道理，1890年开始对弟子讲解“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康有为早期群学的宗旨和内容，即“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等从传统典籍中引申出来的思想和主张。参见姚纯安(2003)。

③ 参见姚纯安(2003)。

④ 参见田辺義明(1999)。

径,让“群学”、“群”概念渐渐退出了思想领域和社会科学视野。与此同时,实际存在于“传统中国”之中的各种非“现代”的群体形式,如家族、血缘群体、村落共同体等,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无可避免地)与现代性意义失之交臂。

在异质对比、二元认识的社会学的意义世界中,中国既有的社会、文化,既难以与“现代性”直接衔接,“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西方”之间,似乎也缺少中间的、重合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社会学者们借助于现代社会科学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亦是他们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中国”的过程以及规划“现代中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早期思想家和社会学者们对西方理论的普适性问题及西方现代性的内在问题等多有意识和反思,^①但植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特性对于中国观、中国事实的预设性的安排,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中国研究,这几乎成为中国学的一种宿命。

二、“乡土中国”:被单性化的传统社会

在近两年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诉求表达中,“乡土中国”的意义再次被激活。在有关“乡土中国”的热议中,论者不仅试图为传统的中国乡土性赋予某种“中国的现代性”甚或后现代性的意义,据此在“中国”内部找到抵制全球化、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资源。同时人们还试图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价值再发现以及近代中国乡村改革历史的总结反思,为陷入“三农”困境的现实乡村社会找到新的出路。

在这样一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乡土中国”这一中国观本身,成了不言而喻的思考起点。“乡土性”这一由现代社会科学逐步建构起来的中国认识,作为理所当然的中国传统性,并没有被纳入到反思者们的

^① 参见应星、吴飞等(2006)。